

清朝八旗

驻防

兴衰史

任桂淳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任桂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戴文葆

封面设计:马丽霞

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QINGCHAO BAQI ZHUFANG

XINGSHUAISHI

任桂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70,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3,100

定价 9.80元

ISBN7-108-00558-1/K·88

000530



◎ 正黄旗



◎ 正白旗



◎ 正红旗



◎ 正蓝旗

◎ 镶黄旗



◎ 镶白旗



◎ 镶红旗



◎ 镶蓝旗



绪 论

清朝用以建立和巩固清帝国统治的军事支柱——八旗驻防，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已散布到包括满洲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全境。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满洲八旗已是一支强悍的军事力量。当满洲入主中原之后，这支军队便面临着一个与以往十分不同的，也许是更为困难的任务，即既要担负起防止内乱、监督汉族地方官吏的职责，又要加强训练，以保持其军事实力，随时准备应付外敌入侵。当然，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原因，他们不但没有完成得了这个历史任务，而且，最后还被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冲垮了。

为了让大家对清政府的这一军事组织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笔者才在多年积累资料的基础上写下了这本书，以使读者对清朝八旗驻防的兴起及其衰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本书首先考察了满洲八旗驻防的组织机构、行政管理和财政状况。而后，对满洲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国的二百六十八年间的腐败过程进行了一定范围和一定深度的探讨。

要了解八旗驻防本身及其衰落的过程，就必须考察它们的原始形态及其发展。在第一章中，笔者主要考察了八旗军事力量在征服中国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及其在中国全境各地区的配置。在第二章中，笔者回顾了八旗系统在入主中原之前时期的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及演变过程。幸运的是，几位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都已经对八旗系统的早期发展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安部健夫的《八旗满洲牛录研究》(论文, 1912)、阿南惟敬的《清初甲士之考察》(论文, 1962)、《清初甲士身份考》(论文, 1963)、《开国初年满洲八旗牛录研究》(论文, 1966)、《清初牛录额真考》(论文, 上、下, 1967)、吴维平(Wu Wei-ping, 音译)的《八旗的发展与衰亡》(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s)(论文, 1969, 该论文主要论述了畿辅地方八旗军的发展和衰落过程)^[1]、三田村泰助的《清朝前期历史研究》(论著, 1965, 该论著主要阐述了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对女真部落的统一及后金的建国过程)、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1983)、周远廉的《清朝兴起史》(1986)^[2]。此外, 王钟翰的论文集《清史杂考》中所收文章《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1957)和莫东寅的论著《满族史论丛》(1958)及郑天挺的论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1962)等, 也对八旗的早期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3]。除以上所列论文和专著之外, 满族人还把他们的入关前的历史用满语作了记录, 载见《满文老档》。该书1955年已被日本学者译成了日文^[4]。这些书和论文对清军入关前满洲社会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论述了八旗驻防的布防过程、初创之后的组织形态及发展情况、驻防的运行机制、管理体系及财政的来源和支出情况。第四章着重论述了八旗驻防衰落和腐败的原因。上述章节都大量使用了原始资料, 加以论证、分析。笔者希望, 通过这本书能够揭示一下清朝制度史上驻防机构这个鲜为人知或尚待深入探讨的内容, 从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下清朝灭亡的原因。

在本书中, 笔者着力于满洲八旗在中原地区的五个驻防——广州、杭州、荆州、福州和绥远城, 对其进行了研究。这些驻防之所以在本书中被选作重点进行考察和研究, 不仅因为上述地区

的驻防志保存着丰富的原始资料，而且因为上述驻防或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或具有最古老、最鲜明的特征。当然，上述五个驻防的内部情况和北京及北京周围的驻防相比，至今鲜为人知也是其原因之一。上述八旗驻防的原始资料，为考察和研究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军事体制、组织机构、管理系统和财政情况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五个八旗驻防的驻防志——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1879—1884年）广州的《驻粤八旗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杭州的《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光绪五年（1879年）荆州的《荆州驻防八旗志》，光绪五年（1879年）镇江的《京口八旗志》，乾隆九年（1744年）福建的《福州驻防志》及乾隆二年至民国六年（1737—1917）绥远的《绥远城驻防志》，囊括了涉及全国八旗驻防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及其他资料。广州、荆州驻防志载有皇帝的敕谕，福州驻防志载有给皇帝的奏章、皇帝给驻防的最高官员的信件及主要官员们的简单自传。通过这些驻防志，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从设立驻防起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各驻防的营制、财政、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此外，由于这些驻防志都记载了皇帝的敕谕，因而，对了解当时清政府的驻防政策也是有所帮助的。当然，这些资料使用起来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它们是经过满洲官员修撰的，所以在材料上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偏见和歪曲。此外，据笔者拙见，这些驻防志的编写者在编撰上述书志的时候似乎还忽视了驻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变迁情况。

为了弥补驻防志的不足，我还采用了有关八旗和驻防的其他资料，包括乾隆四年（1739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的《八旗通志初集》、道光五年（1825年）的《钦定中枢政考》、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钦定八旗则例》、雍正五年（1727年）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钦定大清会典》及《大清历朝皇帝

实录》。

为了填补满洲历史的其他一些空白，在研究方面采用其他二手资料也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八旗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十分丰硕，但绝大部分研究八旗组织和八旗土地方面的日本人却只注重满洲和京畿地区^[5]，而忽视了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驻防中的另一半八旗人口。周藤吉之一九四二年在他的《试论清朝满洲驻防的特殊性》一文中研究了满州驻防的重要意义^[6]。一九五零年，北山康夫在他的《清代八旗驻防》文章中也只着重论述了驻防对清政府的重要意义以及驻防的性质^[7]。与日本的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翟玉树一九七六年在他的硕士论文《清代新疆驻防兵制的研究》中，提供了有关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边境省份新疆驻防中八旗和绿营军的详细情况^[8]。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清代八旗的英文研究资料。有关清代军队建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由托马斯·韦德（Thomas F. Wade，音译）在咸丰元年（1851年）写成的《清帝国的军队》。这篇文章大量使用了翻译成英文的中文资料，如，《大清会典》、《中枢政考》、《户部则例》等^[9]。韦德的文章虽然描述了清军驻防的位置和人数，但它只注重察哈尔地区而忽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驻防。并且，这篇论文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驻防组织、行政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它对八旗和绿营军历史的介绍还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八旗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房兆楹于一九五零年发表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上的《早期满洲军队人数的估算方法》的文章。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这篇论文中有关八旗军队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前的人数资料，但这些人只能是估算，因为当时的满洲政府是将它作为军事机密来进行保守的^[10]。

当然，美国学者恒慕义（Arthur W. Hummel）的《清代中国

名人录》中的有关传记对了解上层满族皇室和满族官员的情况也是很有帮助的^[11]。

前面提到过的吴维平的论文虽然对八旗军队作了涉及面较广的研究，但吴文只研究了驻防刚开始布署时的情况和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八旗组织的历史、中央政府用以防止这些地区八旗成员经济破产的各项政策的详细情况，而没有涉及其他。

罗伯特·李（Robert H. G. Lee，音译）一九七零年写成的《清朝历史上的满洲边界驻防》一书只论述了满洲的前线驻防和该处的八旗土地的分布^[12]。裴皇（Pei Huang，音译）一九七四年编写出版的《顺治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专制政治制度之研究》，则重点阐述了雍正时代中央政府中八旗体系的变化情况^[13]。

通过对以上八旗驻防现有主要资料的回顾与考察，可以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清代整个中国八旗驻防的财政、生活、行政和组织情况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因此，本书对清八旗驻防情况的考察，其侧重点也就放在了以上几个方面。当然，由于资料和其他种种原因，此书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研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至于八旗制度史上的其他问题，诸如汉化、宗教、习俗等，虽然也作过一些简略的考察，但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以后去进行。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八旗军的兴起及其布防	1
第一节 满族征服全国的过程	2
第二节 八旗驻防的状况	10
第二章 八旗制度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	20
第一节 八旗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	21
第二节 八旗制度下的社会各阶层	32
第三章 八旗驻防营制	46
第一节 驻防营制	51
第二节 驻防行政系统	63
第三节 驻防的财政	77
第四章 八旗驻防的衰落	89
第一节 八旗驻防军事组织的衰落	89
第二节 八旗驻防的财政困难	98
第三节 一般旗人的生活问题	117
结论	127
注释	131
参考文献	183
附录	207
一、附表	207
1. 光绪十年(1884年)广州驻防八旗兵丁配备明细表	207

2023/25 10

2. 光绪十年 (1884 年) 广州驻防八旗官兵钱粮领支表	208
3. 光绪五年 (1879 年) 荆州驻防八旗官兵银钱领支表	210
4. 乾隆九年 (1744 年) 福州驻防八旗官兵银钱领支表	211
5. 乾隆二年 (1737 年) 后的绥远城驻防八旗官兵 钱粮领支表	212
6.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年) 前后部分地区驻防军 队分布表 (北京及其军事警戒线之内的地区除外)	213
二、附图	214
1.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年) 前后部分地区驻防分布图 (北京及其军事警戒线之外的地区除外)	214
2. 福州驻防图	215
3. 荆州驻防图	216
4. 广州城郊图	217
5. 成都驻防图	221
6. 乍浦驻防和江宁 (南京) 驻防图	225
附: 今成都市红墙巷保护区 今成都市窄巷子保护区	226
成都市八旗官学旧址 成都市原八旗士兵住宅外景	227
后记	228
作者简介	230

第一章 八旗军的兴起 及其布防

发祥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征服并统治具有高度文明的汉族竟长达三百年之久。然而，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那些投降的汉族将军和官员的协助，只有大约十万人军队的满族^[1]，是无法征服并统治多达一亿至一亿五千万人口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2]。为了笼络汉族的人心，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在其统治前期，满清政府实际上是同这些汉人建立了一种默契的联盟的。这种松散的联盟，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个受封的汉族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等发动叛乱时才告结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的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军队便担负起了双重使命：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汉人军队。当时，虽然也有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但其可靠程度显然是不能被完全信赖的。

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方“三藩之乱”被镇压之后，八旗军队开始在南部中国重新布署驻防，并进一步加强了满族对中原地方的统治。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八旗驻防才永久性地布署在了整个中原地区。这些驻防均设在战略要冲并易于获得军需品的地方。在用围墙圈起来的驻防营地里，居住着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清王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把他们与非八旗人口隔离，二是为了密切监视该辖区内地方官员的活动^[3]。

第一节 满族征服全国的过程

当满族崛起之时，建于洪武元年（1368年）的明王朝早已过了兴盛期，已进入了不断衰落的阶段。当满洲开始统一其他女真部族时，明朝正面临着中国许多朝代末期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宫廷里的宦官专权使官僚体系和军事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政治腐败，派系斗争日趋激烈，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崇祯元年（1628年）至顺治四年（1647年）近二十年间，由张献忠和李自成领导的两支农民军队横扫大半个中国，使当时的中国处于了异常混乱之中^[4]。这样，就给满族军队造成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当明朝正从内部日渐瓦解之时，地处中国东北地区一个雄心勃勃而又有能力的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年），正在加紧进行扩张领土的战争准备。他将满族部落组织起来，使其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合的社会和军事组织——八旗。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已统一了绝大部分的女真部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王朝，其国号之所以叫做后金，是为了表示满族是数世纪前统治北部中国的金朝（1115—1234年）的后裔。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到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挺进明朝控制的辽东地区，打败了明军并占领了辽阳、沈阳等重要城市^[5]，从而拉开了满族征服全中国的序幕。

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1593—1643年）继续推行其父未竟的扩张事业^[6]。皇太极首先向东侵入朝鲜，向西攻入蒙古地区，以保证其东西两翼后方的安全^[7]。正如他的父亲那样，皇太极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扩

大满族的疆域，而且他还十分重视中央政府的集权管理。比如：天聪五年（1631年）他在后金国中，按照更为集权的明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行政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与此同时，他还继续推行满族的军事扩张政策，进军蒙古、山西和察哈尔^[8]。皇太极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明朝的迅速衰落，使得大批中国人不得不向他投降。天聪七年（1633年）明将孔有德（死于1652年）和耿仲明（死于1649年）降满，孔被任命为都元帅，耿被任命为总兵官^[9]，并把他们带来的人马组成了一支不隶属于满族八旗的自成体系的军队。这支由汉人组成的自成体系的约有三千士兵的辅助军队称为“天佑兵”^[10]。天聪八年（1634年）明将尚可喜（死于1676年）自动投降皇太极，他也被任命为总兵官，并像前面两个降将一样，其大约三千兵将的兵马也被组成了置于另一支汉人军队之下的单独的军队——“天助兵”^[11]。

随着满洲八旗和两支汉人组成的辅助军队的长驱直入，节节胜利，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十四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后金”为“清”。该月末，他封孔有德为“恭顺王”，封耿仲明为“怀顺王”，封尚可喜为“智顺王”^[12]。这些封号证明皇太极对汉人将领是重视的。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一支大军，其中包括由受封的汉将统帅的军队，第二次攻打朝鲜，以此来为不断扩充的军队攫取给养。接着，崇德三年（1638年）底，他分派两支军队攻破明国境线一带的长城防线，同时，进入直隶和山东，劫掠了天津、济南等五十多个城市，并掳掠了大量战利品返回驻地^[13]。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以人数空前众多的军队再次进攻辽东地区的锦州。希望能守住辽东的明朝还任命干练的大臣洪承畴（1593—1665年）为该地区的总督，并调遣包括吴三桂（1612—1678年）在内的八个总兵、十三万兵马以加强防守。皇太

极首先在锦州地区大败明军，歼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接着占领了锦州城，满洲军队的威名震慑了整个明廷。崇德七年（1642年），洪承畴被俘，像其他汉人将领一样，也得到了很优厚的待遇，因此，他也加入了满洲军队的行列^[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皇太极总是想方设法争取有能力的汉人将领来为他的扩张事业服务。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后，一个特别议事会推举六岁的皇九子福临（1638—1661年）为皇位继承人，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1612—1650年）担任摄政王。后来，多尔衮继续推行满洲的扩张政策，在长城山海关外的要道上摆开阵势，伺机准备进攻腐败的明朝。当统帅山海关地区的明将吴三桂不顾一切地离开山海关地区，率军追击反叛明朝的汉人李自成的军队时，这个向明政府进攻的大好时机便唾手可得了。

此时，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的李自成占领了北京^[15]。崇祯皇帝自缢。吴三桂作为忠于明朝的大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与这个看起来更为危险的敌人作战，率军向长城以南进发。多尔衮利用吴三桂不在边关的时机移军长城以北并长驱直入，打进了山海关。此时，吴三桂已没有任何有利的军事选择了，他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北有多尔衮、南有李自成的困境中。由于他曾发誓要向李自成报杀父弑君之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决定与多尔衮谈判，向清朝投降^[16]。

遵循皇太极制定的政策，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七日封吴三桂为“平西王”^[17]。吴三桂率一万精兵加入满洲军队。这支汉人军队的加入，大大加强了八旗军，所以，多尔衮才能击败李自成队伍并进入北京城。同年六月六日，原明朝许多臣僚归降了多尔衮。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六岁的福临在北京登极，年号顺

治（在位 1643—1661 年），九月，清首都从沈阳迁至北京，顺治被正式尊奉为天子^[18]。

但是，八旗征服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各地仍然花费了很长时间，因为明朝的效忠者们在此后的近十五年之中继续推行反清复明政策的原故。

起初，清政府在稳固其统治方面面临着两个劲敌。第一个劲敌是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因为他已率军扼守着陕西的战略要地——潼关；第二个劲敌是在南京的以明神宗之后福王为首的南明政府，——因为还有一股顽强的势力在支持着业已倾圮的明政府的旧体制的原故。由于满洲人曾宣称，他们进北京是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报仇^[19]，而反明的李自成军队又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就不得不首先派兵去攻打李自成。

顺治元年（1644 年）十一月底，多尔袞任命他的一个兄弟阿济格（1605—1651 年）为“靖远大将军”，任命另一个兄弟多铎（1614—1649 年）为“定国大将军”，负责协调进攻李自成的战役^[20]，阿济格在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的协助下，从北路进军陕西，追击李自成；于此同时，多铎在汉族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的协助下从河南进军陕西。两军于顺治二年（1645 年）攻下了李自成扼守的潼关。由于李自成逃入西安，所以，同年多铎又将西安攻陷。后来李自成逃入湖北，被当地村民打死^[21]。

当阿济格、吴三桂和尚可喜被命令去追击李自成余部时，多铎就被命令向南京进军，因为此时明朝的福王在那里已被立为皇帝^[22]。

顺治二年（1645 年）六月八日，多铎在无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南京，福王被俘。同年秋，福王在多铎的护送下被递解进北京城^[23]。

尽管威胁满族统治的两个主要敌人至此已被镇压下去，但中